

# 现代性与社会性别理论： 一种方法论视角

李叔君

---

**[摘要]**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融合的路径考察社会性别理论的逻辑，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以及文化三条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

**[关键词]** 现代性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理论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8)06-0168-08

---

“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社会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文化模式，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一种“精神”，也反映着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解读上，那些古典的理论传统，包括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中引伸出来的观点，它们在对形成现代社会格局的原动力解释方面，都忽略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一社会事实，忽略了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这一普遍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传统社会学对男女平等这一基本现代性维度的忽视不利于全面认识现代社会的特征。将性别作为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下半叶社会学理论的一个亮点。一些社会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他们认为，作为人类组织性活动的一种制度，社会性别制度与社会文化中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而存在。“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一样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社会性别理论旨在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文化和经济条件考虑妇女解放的重点和策略，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各国妇女之间的团结。伴随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将社会性别理论与传统社会学的分析路径相结合来考察，既有助于把握理论的张力与拓展空间，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以前常常令传统社会学分析束手无策的现代性维度。本文试图将现代性与社会性别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

## 一、社会性别理论与现代性的逻辑

一种制度建立，或者说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新的“范畴”形成了，它就会根据自身的逻辑与趋势得以发展。现代性逻辑的发展要求有不同类型的行动和不同类型的思想。按照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功能与财富以及文化三个范畴为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性别理论与现代性的逻辑。

### 1. 政治权力的逻辑——现代性与性别身份

传统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诉求通常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基于这样的前提发展而来的有关行动与结构的主张或者对自由与秩序的现代性解读忽略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问题。以性别身份为逻辑起点的社会性别理论则认为社会由男人和女人这两大群体范畴构成，“性别二形态的身体结构”与“性别二形态的再生产行为”联系起来是“性别的核心”。行动者在行动中得到再生。由于不同的性别身份，他们在私人领域受这种身份的专制驱使，在公共领域也永远不能真正摆脱性别规范的控制。这种逻辑认为：一定社会里的性别角色和为每个性别角色设计的规范、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不同的社会机会不断建构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又再生产出男性的优势资源，建构出“霸权的男性气质”，也即是说性别政治通过不同的带有刻板印象的性别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使得本身具有生理差异的社会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被再生产，从而不断强化女性的从属地位。“霸权的男性气质”通常认为默许男人对女人拥有性别权力的社会制度对于维持和建立一种奴役、压迫女人的社会秩序十分重要。与女性的表达性相对照，男性的“工具性”被视为现代社会动力的核心。因此，深化男女平等进程的主要动力，应该在于男人有意识地去变革他们的厌女倾向和压迫性的社会性别身份。

这种“霸权的男性气质”对现代性的解读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是否只有男人才有男性气质？借助个体行为与态度来理解社会的结构和过程，把男人控制的组织和社会作为一种自我身份的最终表达是否合理？按照性别差异两分法，所有关于社会的知识都反映了认识者的社会地位，因此，无论如何都会对世界得出一个带有偏见的理解，不可能存在超越个人社会立场的全面理解。诚然，社会身份对理解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一种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我们应客观认识与定位我们的身份立场。我们的身份不仅仅取决于“性别二形态的身体结构”，还同时来自于他人对我们社会地位的看法，并依赖于教育和家庭背景以及财产拥有这样的一些因素。我们不能否认性别两分法在理解现代性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意义，特别是有关两性职业隔离和意识形态中女性被贬低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对性别之间和性别内部之间的差别进行详细分析，合理认识两性在经验、机会、限制上所具有的具体差别，将其视作社会身份的诸多影响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因素。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于某个民族，并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价值网上，她所占据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不会与任何其他女性相同。

笔者认为，针对“男性气质”带来的现代性困境，我们可以从政治权利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可以通过性别关系的变化，而不是对身份政治的诉求来建立由社会个体地位现代性方面的根本变化带来的性别关系变化。既然男人权力来源于社会地而非自然地建构的“男性气质”，那么也就可以进行社会的挑战和变革。因此，如果要争取更大的性别平等，必须将焦点从怎样废弃和

改革男性气质转移到平等权利政治的深层探求上。

## 2. 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的逻辑——现代性与性别分层

马克思认为人类必须劳动，或者说支配自然，才能生存下去，他主张人们通过交往与合作才能使劳动成为可能，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成为创造性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从劳动或者社会分层出发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发展现代性的逻辑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的理论起点。就此，社会性别理论在传统的对社会分层体系的考察中加入性别变量，该理论认为妇女在生理解剖学意义上的弱小，以及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周期使其在劳动分工时往往承担着有别于男性的功能。不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家庭生活领域，由于相异的两性功能，使妇女在社会分层居于从属地位。当两性中的一方控制了强制手段，就意味这一性别可以用这一力量来支配另一性别，并建立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体系。柯林斯认为，当一种性别获得对性事及相关活动的控制后，男女间的关系就常常变成财产关系，从属的那一性别成为拥有强制手段和控制物质资源的另一性别的财产；当两性间的关系变成财产关系时，就会越来越受到规则的约束，如果规则被规范化，那么这种不平等与一个性别将另一个性别规范性地界定为自己财产的能力、控制强制手段与物质资源的能力有关。被支配的性别最终会提出策略要求改变其状态，这一策略往往是仪式。柯林斯认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从属性别的人会尝试通过仪式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荣誉，削弱支配性别的强制力与物质资源制约，从而改变不平等的境遇。柯林斯的分析指出了妇女从属地位形成后的结果以及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但他没有揭示形成这种强制手段的机制，从而忽略了对现代性动力的探讨。

无论是哪一种层面的现代性动力，都应该有其具体的实践场域，这里必须思考男女权力关系的具体实践场域。根据施特劳斯的观点，文化是从男人交换女人、以便在家庭之间联姻，从而组成社会开始的。家庭构筑了沟通个人与社会的桥梁。韦伯也曾提出，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只有在转换为特定的经济组织亦即家庭形式时，才能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一部分社会性别理论家认为：家庭范畴的特点和它的关系结构决定了我们的意识。通过这种意识，我们第一次观察和构建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在通过社会生产力的组织来认识妇女所属的家庭秩序的模式和结构时，必须注意不同文化中构成“家庭的”和“公共的”不同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通过不同的财产关系、不同的男女互动模式使得家庭形成不同的运作模式。当一边是家庭和公共活动相融合、另一边是家庭和公共活动截然分离的平衡状态时，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固定的模式。当家庭活动与公共社会活动重合时，妇女的地位便相对高一些，甚至超过男人。这个模式与恩格斯的思想非常相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与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而公社制的家庭是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焦点。因此，在产品交换少、私有财产和阶级不平等没有得以发展的社会里，性别不平等也就不明显。

总之，男性、女性对生产手段和剩余产品的分配程度最终决定了性别分层；这种分层的“嵌套”在不同层次的外部环境中：男女两性间的关系嵌套在家庭之中，家庭又嵌套于社区之中，而社区又嵌套于现代社会格局中。对经济权力的控制，也就是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成果分配的控制，是影响妇女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键条件。布卢姆伯格强调，这不仅是妇女经济参与的问题，还在于这种经济参与是否转化为对自己的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分配的控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经济权力带来妇女在社会地位获得以及在分层体系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那么又是什么使得这种经济权力控制成为可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本质上不均等地规范了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要确立某种标

准，以便区分主要工人和次要工人。于是，性别就成为了划分劳动主次性的最自然的标准<sup>①</sup>。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内存在着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特有机制，这一机制使得资本主义从父权制中受益，并在制度、意识形态和实践层面支持父权制。妇女从事一些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无报酬劳动导致了父权制和阶级结构对妇女的压迫。因此实现性别平等不仅要废除父权制还应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通过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的经济渗透降低了妇女的地位，并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加恶化，导致了人口增长、贫穷和收入的不平等。

### 3. 文化的逻辑——现代性与性别文化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文化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理解：被理解成“高级文化”的文化、被理解为“文化话语”的文化以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作为高级文化的文化概念包括心灵、双手以及想像力的创造物，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文化话语被视为一种沟通话语，它既可以在公共领域也可以在私人领域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层面上的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性动力的主要载体；在人类学概念的意义，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文化。由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包含所有被称作文化的生活方式，平等这一现代概念便被扩展了<sup>②</sup>。社会性别理论中的文化逻辑更接近于现代性语境下文化的第二种维度，它期求一种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即实现男女两性平等。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认识上，齐美尔与韦伯都探讨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文化的影响，都关注现代社会中理性增长的文化后果。在性别研究逐渐从中心走向主流的过程中，齐美尔的著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韦伯来说，现代文化发展的特点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即我们逐渐从精神价值中脱离出来，对以往与自然界关系的宇宙式解释发生了怀疑。而齐美尔则侧重于对现代社会中文化客观性的强化、主观性的削弱进行考查。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主观文化的异化。齐美尔将文化分为客观性文化和主观性文化。一方面，人通过自身的活动创造了文化；另一方面，人又受到文化的控制与压制<sup>③</sup>。由于客观性文化几乎是男性活动的产品，劳动分工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的专业化，促使客观化和男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女性的活动较少专业化，劳动分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她个人生命的齐一性，同时由于女性缺少与客观性文化分离的能力，因此只能从事不威胁她存在的整体性并且能表达她本质的活动。另外，就表达自身的主体状态而言，女性比男性具有更直接、更自然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导致女性在创造客观性文化中失败的原因。因此，齐美尔认为，要改变女性从属地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女性在现有的文化之外创造出一种女性特有的文化，即男性无法创造的文化。显然，齐美尔明确指出了妇女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着的文化困境。如果说现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分化、异化、去个人化和碎片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那么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则应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一些批评者认为齐美尔的观点有局限性，即他站在中产阶级妇女立场上认识现代社会，他所指的妇女文化困境仅仅限于中产阶级妇女面临的文化困境。在此基础上，Sandy提出了“性别角色策略（Sex - role plan）”理论。她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规定男女间关系建构的计划，这些计划产生于两种至高的文化导向：一是“妇女生育规划”应该被视为神圣的、自然的“内在性”；二是男人活动应该受到尊重。这些文化导向来源于自然环境的威胁状况和各种有关男女两性及其力量的神话传说。分析“性别角色策略”类型的重要作用正在于通过性别不平等的程度来反映普遍的文化取向。

## 二、社会性别理论与中国现代性：实践与反思

由于现代性与现代化具有理念与现实一体两面的内在统一关系，因此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追

问必然与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出路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化进程中，性别关系已经渗入人类经验的许多层面，从“内在自我”与家庭生活的构成到国家、经济与知识生产等所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然而，现有的现代性理论要么不关心社会性别，要么不能够想象一个女性的主体，这就迫使我们借助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挑战现有对社会生活以及知识的许多理解，多维度地理解现代性。当然，性别在不同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而非单一化存在的关系，社会性别理论在试图与主流社会学融合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1. 对待差异性的问题。社会性别理论将“妇女”视为一个普遍范畴。西方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建构她们的理论时往往将他者确定为非西方的、而把自己作为西方的。这必然限制全世界女权主义的联合。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开来，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与建构。换言之，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東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sup>①</sup>。因此，假设妇女是一个在利益和愿望方面具有一致性的群体、“被证明”具有普遍意义和跨文化有效性的方法论以及潜在于西方女性主义方法论和分析策略中的权力和斗争模式，那么只有当女性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同时发生，才能使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者能够进入主流社会，才能在客观面对男女两性差异的同时，不致使女性内部的差异扩大化。

2. 立场问题。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比，社会性别理论假设每个性别都有一个立场，这一立场导致了男女在思考对象和思维方式上存在深刻的差别<sup>②</sup>。它从权力与统治的角度理解女性和男性，而不是把这两者看成任何主体都可以在语言中获得的位置。假定自己知道“妇女”这个范畴意味着什么，她有可能将具体的“妇女们”（复数，这是真实的、具体实在的主体）同质化、简化为“妇女”（单数，这是一个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建构）的概念。这个“妇女”的范畴假设成了二元结构：女人对男人。它与具体现实中的妇女们是不相干的。性别关系融入并强化了其他已存在的构成关系（譬如种族）。在所有这类统治关系里，任何主体都不能轻易或随意地改变立场。男人和女人都为性别关系所标记。如果主体性诸如男性化和女性化由预设范畴所构成，任何个人主体都不能逃避这些范畴的影响。这与他/她没有自己的语言是同样的道理<sup>③</sup>。于是，社会性别理论在批判主流社会学没有将女性作为认识主体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将女性仅仅作为认识的客体来分析的困境。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遮蔽了妇女的具体实在特性以及她们置身在不同社会阶级和种族结构里的处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妇女虽然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机会，然而大量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目前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深受西方的影响。“现代性的中国式诉求”作为变革中的社会性别理论的最关键问题，令建设现代中国两性平等精神的强烈诉求及其遭遇的挑战贯穿于当前性别研究的整个建设过程。西方近现代各种社会性别思想和理论正是在此过程中，以其各自的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的特征，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借鉴。在这种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受教育、就业等层面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然而，无论是在政治层面、社会分层、文化建设还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国都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当我们在形成妇女这一主体概念的时候，应该对生育、性的劳动分工、家庭、婚姻、家务、父权制等问题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加以考察，合理处理好全球现代性与地方性之间的融合与冲突问

题，只有这样，才把握了在社会关系中研究妇女问题的要义，也才能真正透过社会性别视角展现现代性的图景。

---

文军：《承传与创新：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变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⑭查菲茨：《女性主义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贡献》，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48、242~243、245~246页。

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出版社，第50页。

琼·凯利·加多：《性别的社会关系 - 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选择》，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92~98页。

佟新：《妇女劳动的理论建构》，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⑮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2~221页。

⑯李霞：《妇女的文化困境 - 介绍格奥尔格·齐美尔：妇女、性和爱》，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⑰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⑱简·弗拉克斯：《纯真的终结》，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0~603页。

作者简介：李叔君：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责任编辑 张应祥]

---

## “简朝亮学术研讨会”在广东顺德召开

由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人民政府和广东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顺德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协办的“简朝亮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9~10日在简朝亮的家乡顺德区北滘镇举行。来自广东、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对简朝亮学术文化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要从建设文化大省的站略高度，以地方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历史文化名人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此次研讨会对于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

(成 卉)